

三聯人文書系

陳平原 主編

榮新江 著

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



陳平原 主編

二聯人文書系

榮新江 著

隋唐長安：
性別、
記憶及其他



三聯人文書系

主 編 陳平原

責任編輯 俞 笛

書籍設計 吳冠曼

書 名

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

著 者

榮新江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一〇六五號一三〇四室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字樓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十四字樓

二〇〇九年九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大三十二開 (141×210 mm) 二七二面

ISBN 978-962-04-2882-1

© 2009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國際書號

規 格

版 次

印 刷

總序

陳平原

老北大有門課程，專教「學術文」。在設計者心目中，同屬文章，可以是天馬行空的「文藝文」，也可以是步步為營的「學術文」，各有其規矩，也各有其韻味。所有的「滿腹經綸」，一旦落在紙上，就可能或已經是「另一種文章」了。記得章學誠說過：「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我略加發揮：不僅「良史」，所有治人文學的，大概都應該工於文。

我想像中的人文學，必須是學問中有「人」——喜怒哀樂，感慨情懷，以及特定時刻的個人心境等，都制約着我們對課題的選擇以及研究的推進；另外，學問中還要有「文」——起碼是努力超越世人所理解的「學問」與「文章」之間的巨大鴻溝。胡適曾提及清人崔述讀書從韓柳文入手，最後成為一代學者；而歷史學家錢穆，早年也花了很大功夫學習韓愈文章。有此「童子功」的學者，對歷史資料的解讀會別有會心，更不要說對自己文章的刻意經營了。當然，學問千差萬別，文章更是無一定之規，今人著述，盡可別立新宗，不見

得非追韓摹柳不可。

錢穆曾提醒學生余英時：「鄙意論學文字極宜着意修飾。」我相信，此乃老一輩學者的共同追求。不僅思慮「說什麼」，還在斟酌「怎麼說」，故其著書立說，「學問」之外，還有「文章」。當然，這裡所說的「文章」，並非滿紙「落霞秋水」，而是追求佈局合理、筆墨簡潔，論證嚴密；行有餘力，方才不動聲色地來點「高難度動作表演」。

與當今中國學界之極力推崇「專著」不同，我欣賞精彩的單篇論文；就連自家買書，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專題文集，而不是疊床架屋的高頭講章。前年撰一《懷念「小書」》的短文，提及「現在的學術書，之所以越寫越厚，有的是專業論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眾多陳陳相因的史料或套語來充數」。外行人以為，書寫得那麼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功夫。其實，有時並非功夫深，而是不夠自信，不敢單刀赴會，什麼都來一點，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紅皂白，眉毛鬍子一把抓，才把書弄得那麼臃腫。只是風氣已然形成，身為專家學者，沒有四五十萬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

類似的抱怨，我在好多場合及文章中提及，也招來一些掌聲或譏諷。那天港島聚會，跟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陳翠玲偶然談起，沒想到她當場拍板，要求我「坐而言，起而行」，替他們主編一套「小而可貴」的叢書。為何對方反應如此神速？原來香港三聯書店

向有出版大師、名家「小作」的傳統，他們現正想為三聯書店創立六十週年再籌劃一套此類叢書，而我竟自己撞到槍口上來了。

記得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九三二年出版，也就五萬字左右，錢鍾書對周書有所批評，但還是承認：「這是一本小而可貴的書，正如一切的好書一樣，它不僅給讀者以有系統的事實，而且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思。」稱周書「有系統」，實在有點勉強；但要說引起「許多反思」，那倒是真的——時至今日，此書還在被人閱讀、批評、引證。像這樣「小而可貴」、「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思」的書，現在越來越少。既然如此，何不嘗試一下？

早年醉心散文，後以民間文學研究著稱的鍾敬文，晚年有一妙語：「我從十二三歲起就亂寫文章，今年快百歲了，寫了一輩子，到現在你問我有幾篇可以算作論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如此自嘲，是在提醒那些在「量化指標」驅趕下拚命趕工的現代學者，悠着點，慢工方能出細活。我則從另一個角度解讀：或許，對於一個成熟的學者來說，三五篇代表性論文，確能體現其學術上的志趣與風貌；而對於讀者來說，經由十萬字左右的文章，進入某一專業課題，看高手如何「翻雲覆雨」，也是一種樂趣。

與其興師動眾，組一個龐大的編委會，經由一番認真的提名與票選，得到一張左右支

拙的「英雄譜」，還不如老老實實承認，這既非學術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個興趣廣泛的讀書人，以他的眼光、趣味與人脈，勾勒出來的「當代中國人文學」的某一側影。若天遂人願，舊雨新知不斷加盟，衣食父母繼續捧場，叢書能延續較長一段時間，我相信，這一「圖景」會日漸完善的。

最後，有三點技術性的說明：第一，作者不限東西南北，只求以漢語寫作；第二，學科不論古今中外，目前僅限於人文學；第三，不敢有年齡歧視，但以中年為主——考慮到中國大陸的歷史原因，選擇改革開放後進入大學或研究院者。這三點，也是為了配合出版機構的宏願。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

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

目錄

小序	001
盛唐長安：物質文明閃爍之都	005
關於隋唐長安研究的幾點思考	021
女扮男裝	
——唐代前期婦女的性別意識	037
何家村窖藏與唐長安的物质文化	083
從王宅到寺觀：唐代長安公共空間的擴大與社會變遷	115
盛唐長安與敦煌	
——從俄藏《開元廿九年（七四一）授戒牒》談起	149
《清明上河圖》為何千漢一胡	179
韋述及其《兩京新記》	203
碑誌與隋唐長安研究	235
作者簡介	256
著述年表	258

小序

在北大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的專業是隋唐史，但是我那時的興趣在隋唐的西北史地，更確切地講，集中於西域的于闐國史和敦煌晚唐五代宋初的歸義軍政權。畢業後的一段時間裏，也主要是做敦煌文書的研究，因此對於隋唐史的一些核心問題沒有太多的時間投入。記得田餘慶先生多次告誡我，一隻腳要踏出去，另一隻腳要站在中原，他的意思是要忽略了中國史的基本問題。

在各種各樣的唐朝歷史的舞台上，西北固然重要，但與于闐、敦煌相比，都城長安無疑是演出唐朝歷史故事的最大舞台。所以，我選定長安作為自己研究隋唐史基本問題的出發點，因為長安是我們隋唐史研究者在各個方面都可以用來探討的場域。一九九五年，我提交給在武漢大學召開的唐史學術研討會的論文是《敦煌文化與長安文化》，但並沒有寫成正式的文章。一方面，我雖然想「告別」敦煌學，但敦煌研究畢竟是我用功較多的領域，我與敦煌學界的聯繫也最為密切，一些學術會議要參加，一些紀念論文要撰稿，所以無法「脫身」；另一方面，我從敦煌吐魯番資料出發，更多地轉向漢唐時期中外關係史的

研究，從一九九二年發表《古代塔里木盆地周邊的粟特移民》開始，我的一個研究重點是中古時期來華的粟特人。好像冥冥中有神在安排，一九九九年我發表《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的同時，太原發現了虞弘墓，轉年西安發現安伽墓，隨後史君、康業墓一個接一個地出現，我也隨着一股「粟特熱」，寫了一系列的有關入華粟特人的活動及相關文獻、圖像研究的文章。

記得一九九八年王靜來跟我讀隋唐史專業的碩士生，我當時就說我們一起研究長安吧。可是，王靜從碩士到博士，二〇〇四年七月畢業時，她已經在長安研究的領域有了一些貢獻，而我卻沒有真正投入到長安的研究中來。還好，我在北大歷史系主持的「兩京新記讀書班」（後來也叫「隋唐長安讀書班」）由於許多博士、碩士生和年輕教師的參與，斷斷續續地堅持下來，而且部分成果發表在二〇〇三年底出版的《唐研究》第九卷「長安：社會生活空間與制度運作舞台」研究專輯上。我在這個專輯的前面，寫了《關於隋唐長安研究的幾點思考》，闡發了我對隋唐長安研究的一些想法，特別強調了四個方面的研究有待推進：一、打破從北到南的長安文獻記載體系，注意地理、人文的空間聯繫；二、從政治人物的住宅和宮室的變遷，重新審視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三、走向社會史，對於長安進行不同社區的區分並分析研究；四、找回《兩京新記》的故事，追索唐朝長安居民

的宗教、信仰以及神靈世界。也就是說，要用新的視角，來審視長安，推動「長安學」的研究；以長安為平台，來討論隋唐史的各個方面，走出隋唐史研究的新路。長安，是個巨大的舞台，可以從許多方面加以討論，可以從多種角度加以觀察，可以利用多種史學方法來加以分析，可以撰寫不同類型的史學著作。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指導下，我陸續寫出《女扮男裝——唐代前期婦女的性別意識》、《何家村窖藏與唐長安的物質文化》、《〈清明上河圖〉為何千漢一胡》、《從王宅到寺觀：唐代長安公共空間的擴大與社會變遷》等論文，希望從性別、物質文化、歷史記憶、社會變遷等研究視角，來描寫唐朝長安乃至整個唐朝的某些歷史畫面。這項研究斷斷續續地進行着，文章也往往是為了應某個學術研討會而寫成，所以沒有什麼系統，但在我的研究理論中，這些是我對多年來閱讀長安史料的一點體會，也是我對「長安學」的些許貢獻。當陳平原先生建議我給「三聯人文書系」寫本十萬字的小書時，我就想到了這些陸續發表的、在我長長的已刊論著目錄中非常不起眼的「長安學」論文來，把他們集合起來，便於向隋唐史、「長安學」的學者請教，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醒和鞭策自己：現在，自己已經在為「長安學」大廈的建造壘上了一塊磚，作為一個起點的標誌，應當在這一領域繼續添磚加瓦。

最後，我要感謝提供照片的單位和私人；感謝幫我整理稿件的李芳瑤同學；也感謝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陳翠玲女士接納這本小書，應她的要求，寫幾句關於選文的閒話，以便讀者理解這些文章撰寫的緣由，是為序。

榮新江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二日於香江

盛唐長安：物質文明閃爍之都

一、隋大興城——宇宙之都

唐朝都城長安，承繼自隋朝之大興城。隋文帝開皇二年（五八二）六月，在漢、晉、北周長安城東南十三里處的龍首原，始建新都城。三年三月，新都初具規模，隋文帝即移入新城，自此翻開了中國歷史走向盛世的新篇章。

大興城主要是由富有巧思的宇文愷規劃設計，參與建造的還有閻毗、何稠等人，這些建築家都帶有一些西域胡族的血統，但本人又生長於中華，一直受華夏文化的熏陶，因此，大興城的宮城和坊市的基本模式，應當取法於北魏太和以後的洛陽城以及東魏、北齊的鄴南城，但建築技巧則借助了西域的工藝，使城市既像大理石建築一樣宏偉壯觀，又精準巧妙地符合中國傳統都城建造所遵循的《周禮·考工記》的制度。

隋之大興城、唐之長安城，作為中國古典時代理想的都市，規劃成方形的城市佈局（圖一·一）。城內以坊牆為界，分成規整的一百零八個棋格狀的坊，其數字與《周禮》所言正合；城的北部是皇帝居住的宮城和百官衙署所在的皇城，皇城與南北幹道成直角方形；東、西、南三面城牆各開三座城門，北面則是皇家禁苑；宮城的南面是「前朝」，左為宗廟，右為社稷；這些基本的規劃佈局，都是遵循着《周禮》規定的理想化都城的制度。

位於大興、長安城的宮城——太極宮內側的太極殿，就如同清朝紫禁城的太和殿一樣，是皇帝主持重大朝政的地方，也是隋唐都城的核心。太極殿正對着北極星，天子上應天帝，受命治國。太極殿前承天門外的大街，即名承天街，從承天門經過皇城的正門朱雀門，到長安外郭城的正門明德門，一條筆直的中軸線，構築了一條國家禮儀的延長線，以皇帝所在的宮城為中心，整個長安都是左右對稱的佈局。因此，從都城設計上來看，長安的建設充分考慮了傳統的禮儀制度的實施，是承接天帝旨意、遵循祖宗禮法的充分體現。大興城在建造之初，可以說是為顯示新王朝政權的正統性而建築的「宇宙之都」。

二、唐長安城——生活之都

大興城的設計者們，雖然是按照《周禮》的制度來建造新的都市，但新王朝的恢弘氣度，給這座都市安排了廣闊的居住空間，亦為隨之而來的唐朝，提供了一個走向輝煌的舞台。

公元六一八年唐朝建立後，這裏既有王公、將相、貴族的高門深宅，也有靠典當才得度過年關的窮苦大眾所棲息的陋室小屋；這裏既是不同種族、不同語言的民衆從四面八方

湧入的國際都會，也是各種宗教信徒傳播教法、建立寺院的神聖道場；這裏有各色商販經營牟利的東市西市，也有科舉考生借宿的旅店和尋歡的青樓。三百年的唐長安，不僅是皇家莊重的禮儀舉行的場所，也是市井百姓平凡生活的空間。

物質性的空間架構與人類活動息息相關，社會關係結構的運作反過來又界定、限制或者調節了不同的空間發展趨向。長安城內部的居住構造，也隨着社會的變遷以及人員的流動、文化習俗的轉移，而產生了整體上的分化趨勢。到了被稱作盛唐的開元、天寶年間，隨着大明宮、興慶宮的建立，長安的官僚、宦官、武將紛紛向朱雀街東移動，到安史之亂以後，從長安城總的地理空間來看，大體上是街東為官人居住和參政的地方，街西為平民生活和從事商貿活動的場所。

然而，朱雀大街兩側，依然是進行皇朝禮儀必經的形勝之地，城市中最有影響的佛寺道觀排列兩邊，如開化坊的薦福寺、靖善坊的大興善寺和安業坊的唐昌觀、崇業坊的玄都觀。至少在開元、天寶年間，朱雀街兩邊四坊的範圍內，居住着許多重要的人物：街東興道坊有殿中監左散騎常侍知尚食事李令問宅，安仁坊有玄宗第二十五女萬春公主宅，崇義坊有秘書監馬懷素宅、刑部尚書韋堅宅，長興坊有太子賓客元行沖宅，永樂坊有左丞相燕國公張說宅，靖安坊有玄宗第二十二女咸宜公主宅；街西安業坊有少府監范陽縣伯張去奢